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W. J. T. Mitchell & Mark B. N. Hansen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

[美] W. J. T. 米歇尔 [美] 马克·B. N. 汉森 主编 肖腊梅 胡晓华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

[美] W.J.T.米歇尔 [美] 马克·B. N. 汉森 主编
肖腊梅 胡晓华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 / (美) W. J. T. 米歇尔, (美) 马克·B. N. 汉森主编; 肖腊梅, 胡晓华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ISBN 978-7-305-21167-6

I. ①媒… II. ①W… ②马… ③肖… ④胡… III. ①传播媒介—术语—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7448 号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Edited by W. J. T. Mitchell and Mark B. N. Hansen

Copyright © 2010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33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

主 编 [美]W. J. T. 米歇尔 [美]马克·B. N. 汉森

译 者 肖腊梅 胡晓华

责任编辑 洪 洋 徐 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458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1167-6

定 价 7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櫫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1 / 导 言 / W. J. T. 米歇尔(W. J. T. Mitchell) 马克·B. N. 汉森(Mark B. N. Hansen)

审 美

15 / 1. 艺术 / 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

26 / 2. 身体 / 伯纳黛特·维根斯坦(Bernadette Wegenstein)

37 / 3. 图像 / W. J. T. 米歇尔

47 / 4. 质料性 / 比尔·布朗(Bill Brown)

59 / 5. 记忆 /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77 / 6. 感官 / 卡罗琳·琼斯(Caroline Jones)

87 / 7. 时间与空间 / W. J. T. 米歇尔 马克·B. N. 汉森

技 术

99 / 8. 生物媒介 / 尤金·撒克(Eugene Thacker)

109 / 9. 通信 / 布鲁斯·克拉克(Bruce Clarke)

119 / 10. 控制论 / 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

127 / 11. 信息 / 布鲁斯·克拉克

138 / 12. 新媒介 / 马克·B. N. 汉森

148 / 13. 硬件/软件/湿件 / 杰弗里·温思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

158 / 14. 技术 / 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

社 会

- 171/ 15. 交换 /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 183/ 16. 语言 / 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
- 194/ 17. 法律 / 彼得·古德里奇(Peter Goodrich)
- 206/ 18. 大众媒介 / 约翰·德拉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 217/ 19. 网络 / 亚历山大·R. 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
- 230/ 20. 系统 / 戴维·韦尔贝利(David Wellbery)
- 239/ 21. 书写 / 莉迪娅·H. 刘(Lydia H. Liu)
- 252/ 撰稿人
- 257/ 索引

导 言

vii

W. J. T. 米歇尔 马克·B. N. 汉森

德国媒介科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是一本在媒介研究方面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著作。作者开篇写道：“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基特勒的话语中包含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媒介构成了经验与理解的基本结构和准超验标准。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中，在特定历史时刻，知识之所以能成为知识，这全是看得见、说得出的这类层面的功劳。同样，有了媒介在给定的时间、空间里的调节作用，实实在在的经验才能发生。

这本文集专门讨论媒介研究“批评术语”，其背后的驱动力正是基特勒的这个宏大、深刻的主张。在今天的学术气候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媒介称为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话题，其原因正如基特勒所言。媒介再也不能被视为中立、透明，或被视为它所传播的信息的附属品、补充物而被打发掉。相反，在来自不同群体，代表不同地域、学科及跨学科的学者们的爆发性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了媒介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在这些领域中，“媒介研究”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领域，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它被冠以各种名称：如，麻省理工学院称之为“比较媒介研究”，佐治亚理工学院称之为“文学·通信·文化”。媒介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日益扩大的研究创新的焦点。

尽管媒介研究的地位在体制上得到了巩固，但媒介研究仍然还是一个没有具体形态的事业，它更多是一套联系松散的方法，而非一个统一的领域。人们可能会发现，有些研究者用统计方法去分析观众对媒介内容的反应，而另一些人则关注媒介固化统治或破除陈规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研究者们研究虚拟现实环境、唯物主义人类学、文化史、信息理论史、电影出现之前的设施、印刷体制、希腊文学中单词出现的频率，“媒介研究”对研究这些东西的人全都张开双臂，热情接纳。实际上这个圈子还可以扩大，它欢迎任何跟物品相关的一切实践。也就是说，它欢迎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绝大多数的实践。似乎我们都在搞媒介研究，不管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viii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限定媒介研究呢？或者，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的限定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打开维基百科（为什么不呢？要知道，人们无力逃离媒介，就算想逃也逃不掉，在这一点上，新的计算机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发现定义极简化这一策略可以应对媒

介研究无形态这一问题。“媒介研究”这一条目是这么开始的：“它是对媒介的构成、历史及影响的研究。”接着，它将媒介研究分为两大传统（当然，这种划分很有用）：一方面是“经验科学传统，如通信研究、社会学、经济学”，它主要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研究大众媒介在创造所传播的内容以及在将内容传播给受众的过程中所担当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角色；另一方面是“人文传统，如文学理论研究、电影/录像研究、文化研究、哲学研究”，它的“焦点是媒介的形成，它追问……媒介是[如何]塑造了被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并使之得以传播”。因此，媒介研究包含了任何关于媒介的研究，它可以属于任何学科或跨学科，它还可以根据主宰着那些领域的研究习俗进行再分，这些习俗可分为经验型和阐释型两大类。虽然这个划分远非均质、同一，但它确立了两类媒介研究的方法论。

我们并不贬低这些分类的价值，但我们以及文集所代表的作者们采取的方法却有些不同。我们不是以媒介是这样那样的研究项目的内容为中心。相反，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宏观的理论问题：何谓媒介？媒介概念与各种媒介形式之间如何相关？调节在媒介（medium）或更宽泛的各种媒介（media）的运作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技术、审美、社会等领域构成的联接中，各种媒介如何分布其中？媒介能成为促进这些领域间进行交流的融合点吗？简单地讲，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去探索媒介在概念上的含混性——它由复数演变成了单数，从各种不同形式演变成了一个整体技术平台，一个理论制高点。二元对立（经验与阐释、形式与内容，等等）至今仍是媒介研究的根本结构，我们所说的媒介能牵线搭桥，是个能在二元对立间“斡旋调节”的第三个术语。简要地说，作为一个集体单数名词出现的媒介（media），它象征着技术人类学方面的一个深刻、普世概念的运作。自从有了人类（利用、发明工具的原始人）历史以来，这个概念就一直主宰着人类历史。除了指出人类在某一具体历史时刻所具有的各种单个媒介形式之外，在我们看来，“媒介”一词还指出了一种技术的形式，或形式的技术，媒介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媒介性”（mediality），正是因为它，人类才变成了“生物技术”形式的生命个体。于是，媒介成了一个批评概念，有些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马克思的生产模式，以及德里达（Derrida）的书写概念在其各自领域中所起的作用。虽然这明显是个概念创新，但我们提出的“媒介性”这个一般概念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从亚里士多德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沿途以来的许多理论家的观点。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没有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但在弗洛伊德之后，人们在思考希腊悲剧时若不参考精神分析范畴，这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莎士比亚（Shakespeare）没有媒介的概念，但人们可以把他的戏剧当作形形色色的技术、建筑、文学实践的独特综合体来研究，而且会收获颇丰。因此，媒介这个概念既是一个新发明，又是一个对人类生命形式进行最深层次的考古发掘的工具。我们都深切注意到媒介的技术人类学特点普遍存在，它允许我们跨越分界线。这个分界线是一分为三的分界线，如，社会—技术—审美，经验—形式—内容，社会—历史—经验，而这一点在媒介研究中一般未被提及。

让我们以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2003 年竞选加州州长为例，来说明我们所提出的媒介研究方法。施瓦辛格的胜利常常被归功于他的好莱坞明星地位，仿佛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胜利的保证。但这个解释在我们看来一点也站不住脚。如果明星身份就够了，那我们就不得不解释一下这个事实：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州长和其他行政官员既非演

员,亦非媒体红人,而是那个晦涩无趣的行当(人们称之为法律)的从业者(参见后面彼得·古德里奇对此话题所写的论文)。如果好莱坞明星身份是获得政治任命的充分条件,那么国会里就会到处都是苏珊·萨兰多(Susan Sarandon)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而非爱德·马基斯(Ed Markeys)这样的人。显然这里需要的是明星身份以外的别的东西。那个“别的东西”就是法律、政治制度的本质,它让加州的政治文化不稳定,并且具有平民主义的特点。也就是说,它的规则允许公民投票。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投票把一个不受欢迎的州长罢免掉显得相对比较容易。换句话说,加州有一套特点鲜明的政治调节制度,它能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以及选民的快速干预来**即时推进**局势发展。在别的任何一个州,施瓦辛格的故事要发生,那都会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

但这个媒体事件还有别的含义。施瓦辛格可不是随随便便哪位好莱坞明星。相反,他是闻名国际的“动作片英雄”。让他首先获得偶像地位的是他的获奖健美运动员身份。他如同雕塑般的身材让人想起人类表达最初的媒介就是具有可塑性的身体本身。人们广泛认为,加州州长在加州面临的各种危机面前表现得被动、无力,而施瓦辛格是力量与行动的偶像,这使他在面临任职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个理解进一步得到巩固。事实上,媒体把它拿过来进行了“重新调节”。在罢免投票数周之前的《纽约时报》的显著版面,施瓦辛格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的上面,被崇拜者簇拥着。而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则出现在头条下面篇幅更小的照片中,在跟一位年迈的老人玩宾果游戏。如果有哪个照片排版如同发电报一样报告了(它是不是帮助产生了电报上所说的结果,这个还有待讨论)一场选举的最终结果,那么这个就是。人们可能会想,2008年1月28日的《泰晤士报》中那个类似的排版是否起到了类似的预告效果,以及使预告的内容得以产生的效果。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被崇拜者簇拥,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则独自站在台上,远远地对着观众讲话。

加州罢免州长的选举表明,人们需要一个多维度、“一分为三”的方法来看待媒体事件和媒体现象。这个事件需要政治、技术、审美之间酝酿的一场“完美风暴”。在一个具有独特选举习俗的区域政治文化的某一历史时刻,国际偶像与身体美学相遇,仅靠施瓦辛格的明星身份是远远不够的。

+ + +

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在1966年观察到:“将媒介(media)视为一个单数名词……正在朝文化的上层扩散。”就在那一时刻,或那一时刻左右,当媒介能够被视为单数时——它不是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事实上它大于单个媒介形式的叠加——媒介研究开始以半自主的实体出现。从内容转向媒介,从不同内容之和到集体单数,这些可以说是对媒介进行全面的理论阐述中最先出现的观点,并且至今仍是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核心。在《理解媒介》(1964)中,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媒介与消息进行了赫赫有名的区分,或者说,他将消息定义为媒介本身。从麦克卢汉的立场来看,媒介对人的经验和社会造成影响,其途径主要不是通过媒介所传递的内容,而是通过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和技术特征。在《理解媒介》一书的中间部分,他举了灯泡这个例子。尽管灯泡没有它自己的内容,但它却对社会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它实实在在地照亮了黑暗,从而延长了人类的社交时间。那么“理解媒介”就不仅

x

xi

仅指(或主要指)理解单个的媒介形式(medium)——电、汽车、打字机、布帛——而是要从**媒介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已成为单数形式的媒介形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人们在分析社会变化时关注媒介所起的作用。

麦克卢汉促使我们要把焦点放到不受内容羁绊的媒介上,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将媒介本身定义为内容,而不仅仅是载体或通道。尽管有一些(也许有许多)媒介研究者会发现这里问题比较深沉,但在我们此处所说的媒介研究中,麦克卢汉的转向是媒介研究的奠基石。恰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方法诡谲多变。多元、断裂的历史起源,与媒介相关的术语如**媒介物**(medium)、**调节**(mediation),这些东西都能被囊括进媒介(media)这个术语之中。从词源上来说,我们所说的术语**媒介**不仅仅是**媒介物**的复数形式。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一条解释,它发源于古典主义时期之后的拉丁语 media。在现代单数用法出现之前的好几百年里,它指的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中发音的爆破音 b, g, d。在这一条中,media 一词有好几个定义:除了“古希腊语中发音的爆破音”,或更广泛的“一个(发音的)不送气的停顿”之外,它还指“血管或淋巴血管的血管壁的中间层”,以及“昆虫翅脉序主图案中的……主脉络”。只是在词源的第二条,media 是 medium 的复数形式这一点才被提及。现代所说的 medium 的定义发源于拉丁语,指“中间、中心、中间路线、中间人、中间阶段”。它被分为两个范畴:(1)“在两种程度、数量、质量、阶段之间起调节作用的东西”;(2)“中间人或中间物”,它可以是交易的象征,一种艺术表现的材料,一种“大众通信的渠道”,“一种用来记录或复制数据、形象或声音的物理材料”,“一种物质”(包括“生命组织能在其中得以生存的物质”),或某种能力,它能够通过它对远处的物体产生作用,通过它,印象得以传递而被人感知,或是能与死者进行交流的通灵人。从涉及大众通信这一点上来讲,字典指出,“一个新的单数名词已经出现”。

xii

有一点似乎很明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一个集体单数名词的**媒介**与**大众媒介**的出现紧密相关。从 18 世纪对造纸的投入——它是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的媒介;到 19 世纪的电的发明——它是奇观的媒介;到 19 世纪晚期的报纸;以及 20 世纪的电视,信息通过这些形式得到传递。在上面提到的所有情形中,最重要的不是某一具体内容的形式,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某种东西,它远远大于单个媒介形式叠加之后变成的复数,它改变了人们关于生活方式和宏观生活环境的概念。从这一点来看,现代早期媒介有干预能力这一含义似乎不仅仅是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而且是以一统天下的方式卷土重来,它能超越形形色色的断裂和周期性重生,使媒介这一术语的整体性得以维持。媒介指的是一种有“弥散、包容特点的物质”,人类生命组织能在其中生存,它意味着关系最少、改变最小,最少跟环境偶合(用当代动物行为认知科学的术语来讲),这似乎对我们将人类理解为“从根本上来讲”是假体动物这一点十分重要。**媒介物**(medium)这个单词变成了集体单数名词**媒介**(media)之后,这个最小化的关系本身变成了焦点:因此媒介研究能够而且应该被定位为对我们的根本关系的研究,对调节在人类历史中所起到的不容简化的作用的研究。

实际上,媒介给人一种越来越宏观的感觉,这是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类的延伸”这个概念的核心。通过将媒介——以及调节操作——与感官改变相连,与对人类经验的“理解率”的改变相连,麦克卢汉强调了人与技术之间的根本关系。虽然这个主题他从未明说,但人与技术的

联系赋予了他所提出的媒介是人类的假体这个概念以活力,媒介史也包含着人类史这个逻辑也由此产生,这成了当代一些重要媒介理论家和科技哲学家们的共同事业。例如,文化批评家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作品就展望,去具身化(disembodiment)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信息流通,而根本不必考虑文化现实和物质现实。在海尔斯看来,信息总是与身体联合行动,无论它是以计算机嵌入的形式,抑或是以现象学的具身化的形式,对身体与机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仔细研究,突出强调我们人类是假体动物这一根本特点。

用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麦克卢汉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媒介研究科学看得见的源头。正如基特勒所言,麦克卢汉的媒介科学为理解媒介找到了出路。只有通过媒介构成的基本条件,理解才可能发生。实际上,我们认为麦克卢汉在这两个立场之间开辟了一条道路:跟海尔斯和基特勒相反,对麦克卢汉来说,人类与技术的结对出现最为重要。人类行为与技术物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人类行为与技术物质是两种明显不同的信息载体形式,是两种明显不同的物质化过程,不管两者怎么融合,它们都会保持各自的自主性。对麦克卢汉而言,人的身体既不可被理解作为一种首要的或主要的媒介,如某些后人文主义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也不可被归结为仅仅是对经技术调节后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的接收者,如基特勒所说的那样。相反,麦克卢汉的身体是一个“场地”,它本身不具自足性,但一切调节行为却都在此发生,包括(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调节行为)那些力量能延伸到“皮肤”之外的行为。总之,身体就是一种构建关系的能力,身体要求实实在在的调节。也就是说,没有调节,建立关系就不可想象。

xiii

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的作品与另一位重要的媒介批评家、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观点吻合。斯蒂格勒紧跟他的同胞——古生物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研究,就技术与人类互为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观点:让人打破纪录,让人成为一个特殊种类的原因是人对技术的发明,或对发明技术的发明,即物体不仅仅被当作工具,而且是被当作发明其他工具的工具。斯蒂格勒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假体动物。与史前人类遗迹处于同一时代的化石记录和原始燧石印证了斯蒂格勒的理论。斯蒂格勒宣称,人类通过用文化来传递知识的方式得到进化。那么,技术就是文化的精华、人类生活的媒介,人类与技术共同进化。作为单数形式的媒介半自动地传情达意;作为复数形式的媒介则不断演化出一整套将人类具体外化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人与技术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通过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方面得以实现:一、具体技术过程总是与人类感官及人的理解率相结合,总是在对给定时间、空间中的人类经验进行调节;二、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时刻存在的普遍状况。

有一种概念将媒介理解为一种生活环境,另一种概念将媒介理解为一个狭隘的技术实体或系统。这两个概念极为不同,明白这一点极为重要。¹在媒介明确指向某种具体的技术调节形式之前,与某种具体媒介物相连之前,媒介首先指明了人类的一种本体论境况,即建构性的外化行为和发明创造。许多当代媒介批评家以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的媒介为焦点,却忽视了本体论的维度,他们这样做会有将媒介推向实证论从而将调节行为琐碎化的危险。不管它导

xiv

致的是反人文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基特勒的观点),抑或是杰伊·博尔特(Jay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所谓的媒介与符号之间无休止的“再调节”(remediation)(这个观点本身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对麦克卢汉的观点的调节)。以单数形式的媒介为焦点的研究损失的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存在的分量感,损失的是这些调节操作与人类生命形式之间的联系。

我们还应该强调,我们搬来“人类”这个概念不是企图要恢复某种反历史的人类本质,更不是要恢复传统的人文主义。将媒介(工具、艺术品、代码,等等)而非语言视为构成了人类生命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如果从形而上学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假设人类有别于其他生命形式,那么这个假设现在就有问题了。鸟类、蜜蜂、海狸能造出一种天然的建筑物;动物之间也能进行交流,并且能与我们交流。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在说“人类”时,会强调人性是一项尚在进行中的工作,是一种非常历史化的生命形式,单靠“媒介”不能将人与非人区分开来,将人与非人区分开来靠的是周而复始的媒介革新和发明,以及紧随其后的落伍陈旧。可以把《圣经》里的话稍微改变一下用到媒介上:我们活着,我们前进,我们存在。媒介不是静止的。相反,它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环境或生态系统,这种环境或系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永远维护一种确定的生命形态。最显著的媒介就是人类身处其中的空气,但众所周知,空气也正在遭遇着急剧的人为改变。如今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降雨对环境的影响。气象学研究动态气象模型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如果我们将当今的媒介研究课题视为是对气象学研究的模仿,是一种走向“气象媒介学”(mediarology)的努力,是在跟踪气压系统和风暴前锋如何在我们人为创造的纵横交错的符号世界里曲折前行,这样说并不会太离谱。

+ + +

尽管论文集的文章作者们对媒介担负着不同的使命,更不用说他们的学术兴趣更是千差万别,但这本文集中的论文至少都对媒介与调节操作的宏观背景感兴趣,每篇文章都评价了某一特定理解框架及谱系中的媒介和它的同宗衍生物曾经起过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又重新在极为广阔的范围内成为,并且还继续成为着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核心。文集的作者们对媒介这一术语引发的“中间性”看得很重,他们力图将媒介研究置于一种居间性或中间人的位置,不简单地将其置于现存学科队列之中,而是跨越多个学科,或在两个学科之间游走。我们虽然没有强行要求要切实地将重心由作为实体的媒介转变成作为调节过程的媒介,但是这些文章本身就是调节工作的典范。

xv

我们以媒介研究的三大方法为前提,将论文分为几大板块:本书的开头部分通过审美来讨论媒介问题,即关注感官、身体、艺术领域,将作为个体的人类经验置于中心位置;本书的最后部分的讨论与社会有关,强调媒介在实现交流和集体关系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文集的中间部分从技术出发,其焦点是媒介的机械层面,以及革新创造如何改变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范畴具有任意性,并且许多以一个标题出现的术语换成另一个标题并不困难。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些方法彼此分离。恰好相反,我们想要培养一种综合的方法,以克服媒介研究因分裂而被削弱这个问题。对媒介研究的分裂造成了对媒介研究的削弱,譬如说,它会造成对政治与大众媒介感兴趣的学者发现他们跟关心影响和理解的美学家们很难有共同话题。

我们还想克服这个观念:这些标题中的某一标题是统摄另外两个标题的“决定性范例”。这一点在技术这一方面尤为重要,人们常常将技术视为起因,而把另外两个领域视为结果。当基特勒说“媒介决定着我们的境况”时,我们知道他指的是媒介技术:计算机、打字机、光纤电缆、留声机、印刷机,等等。但是下面这个前提才应该是我们的起点:媒介本身就是被调节的结果。媒介通过个人主体性、集体行为、技术能力之间的三向交流构建而成。这个前提能使我们抵抗错误的技术决定论的诱惑。这个诱惑从一开始就笼罩着媒介研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就宣称“人们可以把法国革命描绘成印刷术的结果,这个原因比较遥远,但它却不可避免”。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不要从这类令人迷惑的观察中匆忙下结论。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结果”既“不可避免”又“遥远”?如果说印刷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那么为什么“印刷术”在荷兰和英国同样也得到了高度发展,而革命却只在法国发生?在“结果”一词中,我们嵌压进去了一条什么样的因果链条?印刷术是现代革命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也许是前者,但显然不会是后者。其他条件也必须具备: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的民众,他们能消费印刷产品,同时他们还要有能享受阅读的趣味。在不同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中,印刷品商店的执照、对出版物的规定约束、对印刷厂老板的限制,这些政治体制上的限制可能会差异很大。人们甚至可以修正哈兹里特提出的准则,把它修改为“18世纪90年代对新闻自由的压制是法国革命后遗症在大洋彼岸的蔓延”³。还有一种类似情况,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期间人们对网络社区产生的乌托邦想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正。人们认识到,网络空间跟任何其他媒介风景线一样,它不是决定着个人经验或社会关系的本质那么简单。相反,媒介本身也必须受制于法律和政治的操控,受制于经济剥削以及个人对媒介不同的运用方式。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技术与科技是媒介革新的主要推手,即使当它们遭遇来自个人和社会结构的阻力时也是如此。通信的新方式、制作形式与形象的新方式、表达观点的新方式,它们大多受到新设备、新器械的驱动,或者说,只有有了这些新玩意儿,才能有这些新方式。只要媒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学科,人们对创造与革新的痴迷执着就会驱策着它往前进。金属铸造技术的发明如何改变了罗马雕刻和中国的钟寺?机械印制硬币的发明如何影响了古代经济?从在石头上刻碑文到在莎草纸上写字,或从象形文字到字母书写,这些变化如何改变了远距离交流的条件以及殖民管理体制?电视机的发明如何使美国法律体制及法庭上庄严的戏剧性传统变得跟以前不同?

这些问题启发人们跨越媒介研究领域,去进行复杂的思考,这里所指的领域包括:人类理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科技发明。我们不把因果语言强加给媒介研究。相反,我们提倡一种作为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的语言,提倡一种关于催化效果及冲突情境的词汇,不提倡某种决定性力量。如果我们做出这个倡导的理由只有一条——被视为单个领域的媒介研究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没能使技术爱好者、美学家、社会政治理论家跨越界线,进行交流——那么似乎这条理由就是恰当的。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关于19世纪媒介史的权威著作别的没展示,就展示了它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模式的蔑视,而且他一次也没提到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马歇尔·麦克卢汉,或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的著

作。x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关于最近艺术实践中的“后媒介”状况的作品几乎也未谈及所涉时期里技术所带来的改变。乔姆斯基的“宣传论”将美国大众媒介视为资本主义精英集团进行霸权统治的工具,他对这些媒介的审美、象征特点不感兴趣,而是把这些媒介简单视为“制造共识”的机器。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这本论文集就克服了这种交流的失败,但我们试着聚集了一系列的话题和学术干预行为,以使这些失败更能为人所见,并且也许还能开启进一步讨论。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希望这些论文能忠于媒介研究奠基人的思想,尤其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作为奠基人的地位是明确的)和沃尔特·本雅明(他作为奠基人的地位是隐含的)。对麦克卢汉而言,媒介这个概念包括了由技术、社会、审美现实构成的一个整体。由于他将媒介描绘成是与人的感官(去感知物理世界、社会生活的感官)相互作用的技术设施,因此他常常被指为“技术决定论者”。但事实上,他的主要策略是想验证技术创造中复杂的辩证法。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是感官的“延伸”这个著名论点相连的还有一个认识:媒介让器官得到了延伸,但也将器官“截了肢”。柏拉图首先指出,书写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种“帮助记忆”的工具,也是一种能导致口头记忆衰退的工具。同样,计算机(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在第5章所说)是媒介史上对记忆术最有力的外化,但它也可能给人类自然记忆的本质带来影响深远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记忆列为媒介研究关键词。我们需要一个作为集体单数名词的媒介研究理论,需要心理学、社会领域、技术领域的融合,而记忆就是能生动展现这些需要的术语之一。记忆常常被视为一种内化了的、天生的心理机能,但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来讲,它从远古时代起就被理解为审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一块交叉地带。对希腊人来说,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是所有时间艺术(诗歌、音乐、历史)的缪斯,是保证人们能以凡人之力铭记要人大事的缪斯。记忆术将记忆作为一种心理机能来训练,它同时也是一种雄辩术和身体表演术。在这里,记忆就是一种能生产文化延续性、传统、神话、集体身份的媒介。于是人们把内在记忆术视为一系列的外部媒介:词与形象、味道与声音、储存与检索系统、物品与身体记号、建筑与雕塑、电脑与钟表、钱币与信用额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记忆的载体,一切都在以极不平衡、极难预测的方式变动(或在原地不动)。这一切都取决于记忆所处的环境,取决于记忆功能被外化的方式。因此,媒介研究既跟主观、思维生活有关,也与机器、代码、社群有关。媒介研究处理的不仅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而且要处理延伸的结果向内投射到情感结构及生命形式之中,从而构成人类的主体性和集体性的方式。

这部文集集中的每一篇论文都讲述了一个“批评术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我们将其列入如下所示的审美、技术、社会这三个标题之下:

审美	技术	社会
艺术	生物媒介	交换
身体	通信	语言
形象	控制论	法律
物质性	信息	大众媒体
记忆	新媒介	网络

xviii

感官	硬件/软件/湿件	系统
时间与空间	技术	书写

警觉的读者会说，这个清单少了许多术语：如结构（structure）、符号（sign）、景观（spectacle）、监控（surveillance）、屏幕（screen）、网站（site）、外观（surface）、风格（style）、模仿（simulation），这些还只是以 s 打头的词。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穷尽一切的词汇表，而是要对目前媒介研究现状起到关键作用的有限词汇进行深入研究，并将论文收集成册。⁴作者必须反思这些术语的历史轨迹，同时还要关注它们在当代的变化。某些术语（如法律、通信、身体）具有古老的血统。其他术语（如大众传媒）则清清楚楚地强调了当代革新，但从技术这个角度来讲，它同时也承认周而复始的革新与落伍、创新与翻新向来在概念上纠缠不清的情况。从书写到印刷、从远近法到摄影机、电视机的发明，以及互联网的出现，情况莫不如此。

需要反复说明的是，大多数术语本来可以放到不止一个标题下面。譬如，书写就可以毫不费事地从社会这个标题移动到技术这个标题下，而通信可以从技术这个标题下移动到社会这个标题下。其他术语看起来明显只适合某一范畴。例如，艺术就不能从审美调整到技术。尽管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常常被视为是一件让艺术家和艺术都掉价的事，但从无从追忆的远古时代开始，艺术家就一直在利用、滥用，甚至操纵着技术。事实上，审美名义下的术语看起来特别保守，并且与古老传统捆绑在一起，而技术范畴之下的术语则包含了相对新颖的概念（包括恐怕已经重复到让人吃惊的术语——技术——本身）。再次声明，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搭建一个关于媒介思维的固定框架，而是为了搭建一座纸牌屋，它能够（它总是在被——而且应该被——重新洗牌）构成无穷无尽的组合。我们的要点是真正建立进入媒介迷宫的三向通道，而且我们知道，其中的每条通道迟早都将通向另外两条。

这里，我们的媒介以及媒介研究方法又出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首先，为何要“一分为三”？面对媒介研究基本概念的系列文章，难道这一独特的三分法——社会、技术、审美——就是唯一可理解的组织这些论文的方式吗？部分原因就是，我们想要避免二元论的诱惑。在辩论话语和不是很具分析性的话语中，二元论是盛行的修辞：如过去与现在、新与旧、技术与社会、社会与个人、主体与客体、空间与时间、自然与文化、古老与现代。我们尤其想要避免当今“新媒介”研究中泛滥成灾的现代主义。我们的目标是要收复这片领土，要越过过去 20 年的“数字革命”，回到它在古代和现代早期的更远的源头，将媒介史视为一种在空间、时间方面都极具差异性的东西。因此，亚历克斯·加洛韦（Alex Galloway）关于网络的论文不是从互联网开始，而是以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抛向阿伽门农的那张网开始。

将媒介话题一分为三还有一个更隐晦的原因：我们有一种直觉，人们一直，而且处处都以三分模式来理解媒介。想想我们仅在下面列出的这些最明显的例子：通信理论中的发送者—信道—接受者；符号学中的象征符号—指索符号—图像符号；罗兰·巴特美学中的形象—音乐—文本；亚里士多德分析模仿中的扮相—音乐—台词；拉康精神分析范畴中的象征界—想象界—真实界。再想想三段论结构，它的“中项”被称为媒介（medium）。

但是抛开这些抽象的东西，我们对罗兰·巴特所说的“第三层含义”（叙述层含义）的探寻受媒体事件、操作及环境等实践现实的驱动。那么，我们将话题一分为三，这种方式强调了媒

介研究的“中间性”，强调了媒介在无数其他学科之间起到的媒人、斡旋者的作用。从远古时代的马赛克到数字形象，从人类法律准则到生命代码本身，处处都有媒介的影响。“媒介”究竟是一样东西还是许多样东西？它是单数还是复数？那个单数、具体的媒介物（medium）与浩若星河的被称为媒介（media）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要抓住这一两难问题的犄角，制服这个难题，我们会深究“调节”（mediation）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概念，它的谱系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哲学、辩证法及批评理论。如果迄今为止我们的中心是放在媒介（作为 medium 的复数形式 media）上，放在它的历史及单数化过程中的语义操作上，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致力于探索第三个术语——调节，它本身是如何调节的，如何让作为单数形式的媒介与作为复数形式的媒介在不同的过程中达成多种不同层次的调节。

+ + +

虽然调节一词可以延伸到远古时代，它指的是一种解决商业争端的方法，但调节一词也具有我们这里从德国唯心主义（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中得到的价值。对黑格尔来说，调节是一种抽象运作，辩证法通过它得以推进。用《精神现象学》的话来说，理性或精神辩证法在对每组冲突（成对的观点或对立面）的扬弃（Aufhebung）过程中前进，它本身就包含了要不断地在过程中进行的调节操作。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绝对知识——哲学逻辑和世界历史的终极成果。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真正完全改变这一操作，但他们的确以黑格尔无法想象的方式使调节与现实相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中，调节是社会冲突力量之间、物质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主要关系形式，调节也指的是社会冲突力量之间、物质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和解。人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看到的这个分析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已经初现端倪：他将调节理解为劳动，劳动在工人的身体与自然之间进行调节，说得更宽泛一些，是在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进行调节。对劳动力进行剥削，使劳动力物化之后，资本产生了。资本本身成了调节行为的代理人：资本家决定了劳动的交换价值，因而将劳动力变成了商品。

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理论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调节，以及社会行为人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获得何种程度的能动性。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这一支脉多多少少直接来自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强调意识形态在资本的运作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一派的观点中，能动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意识本身就是“关于生活现实的想象性的关系”。如果意识必然是“虚假意识”，那么这个立场的逻辑就行得通，社会行为人为人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所受的压迫。在媒介研究中，这一支脉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这个概念中找到了实实在在的例子。大众媒体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样也能削弱社会行为人为人可能具有的社会能动性。

另外一个支脉发端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霸权这一概念的革新（它是国家权力的另一种更灵活的说法），并朝不同方向开枝散叶——包括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厄尼斯特·拉克洛（Ernesto Laclau）及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作品，意大利学派的作品[从拉扎拉托（Lazzarato）到哈尔特（Hardt）及涅格里（Negri）]，以及最近将马克思主义与媒介研究结合起来

的努力。这一支脉更强调调节,因此他们构想的社会能动性更加强健有力。对这些不同的理论家而言,调节指明了一个高度动态化的过程,个人及集体行为人与作为生活现实的资本的力量勾连。对这些思想家而言,资本的控制不可能是绝对的,或绝对反人文主义的(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其原因正是因为,只有通过对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资本才能得到维持(能不断地被重新表达)。

媒介研究是什么?它的范围在哪里?它在当今能够是什么?为了阐明动态调节对于讲清楚这些问题的意义,让我们回到基特勒的“媒介决定我们的境况”这句话。记着我们前面对媒介的悖论式的双重性所做的探讨,现在我们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来看看这个观点。基特勒显然将 media 视为 medium 的复数形式,是一种对事物的经验的累加,他的意思似乎跟晚期马克思的决定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或资本基础设施对社会行为人的意识的作用)更为相似,而非与更具动态性的葛兰西的观点相似。对基特勒而言,媒介似乎决定着我们的境况(即在某一技术—历史结构中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方式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的表述没有多大的不同(尽管价值已有根本改变):媒介系统顶多对人的经验及人的能动性带来积极影响,但它更可能“只不过是洗了下眼睛的骗局”,“是选择性输出”,这就是基特勒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一书的前言中所做的构想。

这本文集中的论文对基特勒的观点多有涉及。但当我们把“媒介决定我们的境况”放到我们媒介研究发轫点这个位置上,由对事物和技术做经验性收集的媒介转向作为一种理解角度的媒介,这使我们能再次确定调节在社会、审美、技术、批评(这一点排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之间所起的关键性的、高度动态化的作用。基特勒的观点似乎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我们没有抛弃基特勒作品中的重要发现(以及当代媒介研究所做的许多考古性工作)——媒介的确具有能动性,的确约束着人们的经验(而且有这个必要)。我们试图将媒介的经验能动性和超验能动性重新融入更大的社会领域,融入调节领域,在这里,文化与生命真真切切地发生。为了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家[如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保持一致,我们不提倡媒介研究提及在某一对象或内容上的所作所为。作为一种理解模式,一种我们参与世界的角度,媒介研究修复了基特勒的反阐释批评理解(其他的批评家如贡布里希[Gumbrecht]也持基特勒这一批评观点),而修复的方式恰好是在新的境况中去理解。人们需要理解的不是作为复数的媒介,而是作为单数的媒介。通过将媒介理解为单数——也就是说,通过从单数媒介的视角来重新构想、理解——我们将会发现,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作为复数的媒介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刻画将远不止沿着斯蒂格勒所建议的路线:把技术视为人类生活的相关物,从技术运用这个单一维度去叙述。这样的刻画必定会让调节参与到我们已经人为分割开来的各个领域之中:社会、审美、技术。这些调节本身又要求另外一种调节——批评调节,而这正是本文集最终要担起的重担,并且从媒介的角度理解新麦克卢汉主义的训谕。不是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媒介就是我们的境况,这样说也许更恰当。

xxii

注释

1. 这里应该提一下,“媒介生态”这个概念最先由尼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提出,他追随了麦克卢